

“革命者的失望”与“革命联盟”内部分裂*

——对埃及和突尼斯“阿拉伯之春”参与者的数据分析

周亦奇

【内容提要】 2011年以来,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对埃及和突尼斯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该运动产生的各种研究议题中,参与过此次运动的民众对于该运动的评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以“革命者的失望”为视角对此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革命者的失望”这一变量反映了“革命联盟”在胜利后的分裂进程,是转型阶段中各种政治力量权力斗争、经济冲突与理念冲突的体现。以上三种类型的冲突可操作化为民主支持度、经济地位和政治伊斯兰等三个变量,并根据“阿拉伯民主晴雨表”的数据,对以上变量与“革命者的失望”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都出现了先前运动参与者对此运动发展的失望问题,不过,具体影响失望的变量在两国有所不同。在民主支持度上,虽然埃及和突尼斯民主支持度对参与者的失望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其方向完全相反。在经济地位上,突尼斯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埃及却没有出现显著的影响。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作者创新性地将政治伊斯兰分成政策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和政权伊斯兰等三个维度,并且发现三个维度的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呈现的影响并不相同,反映了政治伊斯兰与“革命者失望”之间的微妙复杂联系。

【关键词】 阿拉伯之春; 后革命政治发展; 革命联盟; 定量分析

【作者简介】 周亦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

【DOI】 10.14093/j.cnki.cn10-1132/d.2018.04.005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4X(2018)04-0127-30

* 作者感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王凯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王玉柱副研究员对此文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同时也感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两位匿名评审专家的评阅意见以及编辑部老师认真负责的工作,文责自负。

自 2011 年起，一场由突尼斯而起的政治风暴席卷了北非大地，在这场被冠以“阿拉伯之春”之名的政治转型运动中，埃及和突尼斯大批普通民众走上街头，聚集广场，用抗议游行等方式最终逼迫执政领导人下台退位。如今，“阿拉伯之春”已经过去七年了，而经历这场政治运动的北非三国依然都在自身转型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下求索，在这个“后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当时参加过运动的普通参与者对此次运动得失的评估是否一致？这些参与者是否存在对这场运动的失望情绪，并且影响这一判断的因素又是什么？其对于我们理解“后革命”国家的政治竞争主要矛盾的意义是什么？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本研究以“革命者的失望”为主要研究变量，讨论在政治运动后普通民众对于运动结果的不同评价，并且分析了影响这一变量的相关因素。本文认为，“革命者的失望”反映了取得夺权胜利的“革命联盟”在“后革命时期”的分裂问题。对“失望的革命者”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推断出当时“革命联盟”内部正在出现分裂矛盾。本文以“阿拉伯民主晴雨表”（Arab Barometer）2013 年对埃及和突尼斯问卷调查为基础，在其中选取了在埃突两国参与过此次运动的相关民众作为样本，并结合相应理论，从民主支持度、经济地位和政治伊斯兰等三个层面分析了相应因素对参与“阿拉伯之春”的普通参与者产生对此次运动失望认识的影响。

一 “革命者的失望”与“革命联盟”分裂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革命者的失望”是如何导致埃及和突尼斯在“阿拉伯之春”之后“革命联盟”的分裂进程。“革命者的失望”是指“革命联盟”内部的参与者在推翻前政权的领导人后，对政治运动的成果产生负面的评价情绪。对于此概念的分析，本文将其置于“革命联盟”的分析框架内，将“革命者的失望”视为此联盟内部出现分裂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并且以“革命联盟”中普通参与者对此问题的看法作为研究切入点，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概念、研究议题和研究视角。

第一，在研究概念上，本文使用“革命联盟”的概念来讨论“革命者的失望”这一问题，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在既有的革命理论中，“革命联盟”（Revolution Coalition）是指在革命

运动中形成由多个社会群体形成的抗议者联盟。^① 根据既有的研究,在本文所选取的埃及与突尼斯两个案例中,都出现了明显的“革命联盟”的特征,呈现出明显的跨阶级和跨意识形态的特点。一方面,在参与政治运动的群体中,既有律师群体、社会组织等中产阶级,也有以小商贩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在埃及和突尼斯的抗议人群中,既有许多秉持世俗理念的世俗反对派,同时还有相当多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正是在多个阶级和群体的合力下,埃及和突尼斯的“颜色革命”才可以取得成功。^② 故而,这一概念可以适用于本文所分析的埃及与突尼斯的运动参与者。

其次,相比较于传统的革命研究理论,“革命联盟”这一概念并没有将参与者群体视为铁板一块,^③ 将运动的参与者群体从单一的社会集团变成了不同阶级、利益集团与政治派系之间组成的联盟。此概念提出使得研究者的分析下沉到“革命集团”内部的博弈之中,并将联盟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作为研究重点。本文所讨论的“革命者的失望”,其实也是“革命联盟”内部各种群体博弈竞争的体现。因此,将本研究的因变量放置在“革命联盟”这一概念框架下讨论可以提升其理论思考程度,并且通过“革命联盟”的讨论,也可以更进一步地确定本文与既有研究的关系及其可能的贡献。

第二,在研究范畴上,本文讨论的“革命者的失望”,属于“革命联盟”在胜利后分裂问题的一部分。在既有的对“革命联盟”的讨论中,主要存在三大主题,

① 对于“革命联盟”的讨论,可以参考 Jeff Goodwin, *No Other Way Out: State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1945-19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Boston: Addison-Wesley, 1978; John Foran, “A Theory of Third World Social Revolutions: Iran, Nicaragua, and El Salvador Compared,” *Critical Sociology*, Vol. 19, No. 3 (July 1992), pp. 3-27; Jack Goldstone, “Toward A Fourth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y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No. 1 (June 2001), pp. 139-187; Dan Slater, *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Mark Beissinger, Amaney Jamal and Kevin Mazur, “Explaining Divergent Revolutionary Coalitions: Regime Strategies and the Structuring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Tunisian and Egyptian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8, No. 1 (October 2015), pp. 1-23.

③ 这类研究,通常认为革命是单一的一个社会群体推翻另一个统治集团阶级的过程,参见 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毛泽东同志对于革命的经典定义也认为“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参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44 页。

分别是“革命联盟”组成、运作与转型。在政治运动胜利前，“革命联盟”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一联盟能否组成，^①而在政治运动进行之中，联盟内部成员的变化是该阶段讨论的重点，^②而在政治运动胜利后，联盟下一步怎么转化则是此阶段研究的重点。而“革命者的失望”属于第三阶段的研究问题。一般而言，在此阶段“革命联盟”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联盟内部的分裂问题。联盟内部的分裂问题是指在夺取政权的的目标完成后，“革命联盟”内部的各个势力开始为了自身政治利益与主张而相互竞争的过程。

在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中，“革命联盟”分裂的不同形式及其产生影响是不同研究的焦点。有的研究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分析“革命联盟”分裂后导致极化现象与政治暴力的关系。^③还有学者的研究分析“革命联盟”内部组织结构最终与政治运动后分裂形成的政党体系的关系。^④而本文研究分析的问题“革命者的失望”则从政治运动参与者的主观认识入手，分析导致不同参与者对运动满意程度认识发生变化的影响因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革命者的失望”是属于“革命联盟”分裂研究中的一个部分，其反映了“革命联盟”分裂的相应特点，但是“革命者失望”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革命联盟”分裂的结果。“革命联盟”的最终分裂结果是在行为体主观意识、行为以及外部约束条件共同影响下发生的，本文所提出的“革命者的失望”代表了其中主观意识分裂的部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等同于这就

① 这一部分研究在社会运动与内战等抗争性政治中都有体现，具体的研究可参考 Mohammad Kadivar, “Alliances and Perception Profiles in the Iranian Reform Movement, 1997 to 2005,”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8, No. 6 (December 2013), pp. 1063-1086. 此研究讨论在伊朗的社会变革运动时期，不同社会组织转换结盟的情况，其认为行为体的主观认识是影响此变量的关键。内战中的反对派联盟变化过程可参见 Fotini Christia, *Alliance Formation in Civil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周亦奇：《内战反对派武装的联盟构建与内部冲突——以叙利亚内战为例》，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2期，第125-147页。

② 经典的研究可参考 Jeff Goodwin, *No Other Way Out: State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1945-19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Boston: Addison-Wesley, 1978。

③ 根据美国学者杰克·戈德斯通 (Jack Goldstone) 的研究，革命联盟的转化可能会出现一种极化与瘫痪的情况，革命联盟内部分裂最终演变为严重的暴力冲突，先前并肩战斗的盟友变成了相互敌视甚至自相残杀的敌人。参见 Jack Goldstone, “Cross-Class Coalition and the Making of Arab Revolts of 2011,”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7, No.4 (December 2011), pp. 457-462。

④ 此研究分析了波兰团结工会松散的组织与捷克公民论坛不同组织结构，最终对东欧剧变后相关国家政党制度化影响。参见 Herbert Kitschelt, Zdenka Mansfeldova, Radoslaw Markowski and Gabor Toka, *Post-Communist Party Systems: Competition,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Party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是“革命联盟”的分裂。^①

第三, 本文将以“革命联盟”中的普通参与者作为相应的研究视角。一般而言, “革命联盟”可从社会结构、政治精英和参与民众等三个不同的视角^②进行讨论。社会结构层面主要从该国的宏观结构与制度体系(如政治制度和国家-军队关系)等分析此问题;^③ 政治精英层面则是从政治精英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讨论此问题;^④ 参与群体层面则是通过研究普通参与者对此问题的看法, 其侧重于分析与普通参与者相应的社会属性(身份认同、阶级地位)等变量入手, 分析“革命联盟”中的主要分裂点(Cleavage), 并对其走势进行分析。基于本文所讨论的“革命联盟”和实际所掌握的数据, 考虑将采用民众参与运动的视角进行讨论, 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 “革命者的失望”是一种对于运动中不同成员对其结果的评估, 是对普通参与者主观认识的研究。因此, 因变量比较微观, 而较为宏观的结构性变量因为更适合解释较为宏大的结果, 对解释本文问题并不妥当。第二, 因变量侧重普通参与者对运动结果的评估, 故而不等同于“革命联盟”中不同派系的领导人对此问题的看法。因此, 在问题讨论中, 单纯的精英视角也并非本文所希望采取的视角。当然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采取运动中参与民众的视角, 并非是否认结构性因素和精英在此问题上的重要性, 而是在研究问题和具体数据等条件的约束下, 采取民众的视角是更为妥当的研究视角。

① 对于此问题更为全面的分析, 将在笔者下一篇文章中进行。

② 以上三个视角可以对应于转型研究中常用的三大范式: 结构主义、战略行为体与社会力量范式, 对于此三大范式的讨论, 可参考 Jack Goldstone, “Cross-Class Coalition and the Making of Arab Revolts of 2011,”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7, No. 4 (December 2011), pp. 457-462.

③ 国内制度与革命联盟构建认为更具压迫性的国家制度可以导致不同利益范畴的群体集合起来, 最终形成联盟, 其代表作是 Jeff Goodwin, *No Other Way Out: State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1945-19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军人政治则认为, 通常当前政权拥有较强的军队势力, 形成了类似自主性军队的权力结构时, 这时新上台的政治势力, 通常难以对于这样的军队形成有效制约, 故而革命成功后的革命联盟将有可能被前政权的军队分化瓦解, 或者在革命联盟出现内部分歧时, 前政权的军队可以乘虚而入, 直接干预。参见 Scott J. Cook and Burcu Savun, “New Democracies and the Risk of Civil Conflict: The Last Legacy of Military Rul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3, No. 6 (November 2016), pp. 745-757; 周亦奇: 《政治转型中的军人: 军队特性与政变结果》, 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1期, 第110-135页。

④ 在精英斗争层面, 与本文比较相关的是中国学者曾向红的作品, 其提出要理解埃及和突尼斯在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的转型结果不同, 关键是要理解相关政治参与者政治妥协的问题, 其认为在突尼斯各个政治党派形成的政治妥协是该国政治转型成功的关键。参见曾向红、陈亚洲: 《政治妥协与突尼斯的和平政治过渡——基于对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考察》, 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2期, 第60-81页。

在既有文献中,与本文具有较为直接关系的讨论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分析“革命联盟”在胜利后分裂问题的研究,第二类是对“革命联盟”本身的研究。在第一类研究中,近年来国际上的代表作有圣蒂亚哥·安利雅(Santiago Anria)与珍妮弗·西尔(Jennifer Cyr)的文章,其研究讨论了革命党的联盟构建及其在胜利后的联盟维持情况,其以玻利维亚为案例,通过案例内部比较的方式,讨论革命党内部的利益组织情况与最终联盟维持结果的不同。^① 第二类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作者则是普林斯顿大学马克·贝辛格(Mark Beissinger)。其通过直接调查问卷的方式,分析在乌克兰“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中影响民众参与革命的原因。^② 在研究方法上,他将“革命联盟”操作化为参与过“颜色革命”的民众,并使用相应的问卷调查进行研究。本研究基本遵循了此研究思路。

以上两类研究都对本文提供了非常巨大的启发,但是这两类研究也存在有议题但无微观数据和有数据但无议题两种问题。

在第一类研究“革命联盟”分裂的文献中,其讨论的议题与本文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它并未将分析的层次下沉到具体的革命参与者层面,而是采取更为总体性的视角,并使用宏观整体性数据(Aggregate Data),将“革命联盟”的分裂用诸如政党脱离联盟、军队政变等方式进行测量,而在其自变量层面,其分析层次上也主要停留在组织和精英层面,例如分析在玻利维亚革命后,革命组织内部的精英利益分配模式;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其他世俗政党之间的博弈等。^③ 此类分析有两个不足之处:第一,这类分析其实存在一个隐含的假设,即参与运动的政治派系中,政治精英是完全领导并可以彻底代表民众的,因此忽视了普通参与者的自主性。此外,在对“革命联盟”分裂的形式判断上,其采

① Santiago Anria and Jennifer Cyr, “Inside Revolutionary Parties: Coalition-Building and Maintenance in Reformist Bolivi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50, No. 9 (August 2016), pp. 1155-1185.

② Mark Beissinger, Amaney Jamal and Kevin Mazur, “Explaining Divergent Revolutionary Coalitions: Regime Strategies and the Structuring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Tunisian and Egyptian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8, No. 1 (October 2015), pp.1-23; Mark Beissinger, “The Semblanc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Coalitions in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No. 3 (August 2013), pp. 574-592.

③ 曾向红、陈亚洲:《政治妥协与突尼斯的和平政治过渡——基于对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考察》,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2期,第60-81页;周亦奇:《政治转型中的军人:军队特性与政变结果》,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1期,第110-135页;Mohammad Ayatollahi Tabaar, “Assessing (In)security after the Arab Spring: The Case of Egypt,”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46, No. 4 (October 2013), pp. 727-735.

取的数据也多半是较为显著的事件性数据,例如当观察到“革命联盟”内出现政变、内战、清洗等政治暴力行为时,其即认为此联盟内部发生分裂。这一类分析固有其道理,不过忽视了在此分裂进程中参与者自身的主观观念等较为难以直接被观察的情况的影响。

在第二类研究中,其在数据层面关注到了本文也感兴趣的微观层面,但是在既有利用相应数据库的研究中,多半将关注点放在“革命联盟”的形成问题上,而没有将关注点放在“革命联盟”分裂的问题上,在议题上与本文形成了错位,故而也使得本文对此问题的研究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

基于此,本文希望对此讨论做出的贡献是:

第一,从理论价值上,希望通过对普通参与者失望认知影响因素的分析,从而在既有的对“革命联盟”分裂的讨论中,增加政治运动普通参与者这一维度。本文并非要驳斥既有研究的相关理论与假设,只是试图在分析层次与分析问题上将此领域的研究朝着更为微观与基础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得这一问题在学理上的讨论更加完善。此外,从理论发展的角度而言,还试图通过对案例中数据的分析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理论,并提出发现新理论的可能。

第二,希望通过微观数据来对较为宏观的“革命联盟”现象提供描述性推断。因为“革命联盟”分裂进程是一个发生在宏观层面、且难以为直接的观察所把握的进程,而既有研究中对于事件分析的强调,可能使得我们判断联盟分裂的分析始终停留在小样本的案例阶段,而本文将分析层次下沉到个体层面,通过个体对此问题的主观认识,来推断“革命联盟”的分裂情况,无疑可以为此问题的分析提供更加扎实的经验证据支持。

第三,试图在研究方法上有所贡献。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涉及普通民众和相应的阶级与意识形态群体,其通常需要对普通民众的直接观察数据,而由于这一群体数量众多,并且沉淀于基层,故而传统的研究通常难以获得较为系统的对于普通民众态度的数据。而这一数据匮乏的问题在近几年来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伴随着近年来数据搜集技术的日益发展,目前已经出现了不少涉及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之春”参与民众的数据库,本文所采取的“阿拉伯民主晴雨表”数据集正是这其中一个代表性的成果。并且,从方法的角度考虑,由于目前国内对于“阿拉伯之春”及中东地区的转型侧重于使用历史和定性的方式进行分析,而利用定量手段对大样本的普通民众态度进行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已有大量的研究采取数据分析的方法分析阿拉伯地区的民众对于相关政治问题的态度。以本文所

要讨论的“革命联盟”为例，目前已经有研究分析埃及和突尼斯“阿拉伯之春”中产生“革命联盟”的原因。^① 故而本文也将遵循既有研究中所采取的定量研究的方法取向，从而推进当前国内对此问题量化研究的进展。

二 “革命者的失望”及相关影响因素

“革命者的失望”反映了一国政治转型过程中新上台政治势力的内部矛盾，而在既有的研究中，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分为权力斗争、经济冲突与理念矛盾等三个视角。

（一）“革命者的失望”与“革命联盟”三大内部冲突形式

根据经典的革命自然史理论，在革命获得胜利后，通常会经历一段由“蜜月”向“痛苦”的过渡时期。^② 在蜜月阶段“革命联盟”所有成员都沉浸在推翻旧制度的胜利喜悦之中，但是伴随“蜜月”的逝去，当联盟内部矛盾成为革命成员遭遇的首要问题后，联盟内部成员就会为了实现自身的相应主张而开展政治竞争，在此次竞争中的失败者就会对革命的结果产生失望情绪。故而，分析“革命者的失望”是为了通过对微观变量的分析而描绘出宏观上“革命联盟”内部政治斗争的进程。通过分析影响“革命者失望”的变量，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出当时“革命联盟”内部正在经历着何种层次的内部冲突。故而，我们需要采取从理论到经验的研究路径分析“革命者失望”的影响变量。首先，根据既有的联盟分裂相关理论，寻找可能造成的影响参与者失望情绪的相关变量，并将其可操作化为在微观层面的变量。然后，我们通过微观经验层面的数据分析，推断在某个具体的案例中，其内部分裂的表现形式。根据既有理论，本文提炼出三种可能影响“革命联盟”内部部分成员失望认知的三种冲突形式，分别是：权力冲突、经济冲突和理念冲突。

1. 权力冲突

权力冲突是指在政治运动胜利后，“革命联盟”内部因为权力分配的问题产生矛盾，此矛盾的焦点是权力垄断与权力分享之间的张力。在既有的政治学理论

^① Mark Beissinger, Amaney Jamal and Kevin Mazur, “Explaining Divergent Revolutionary Coalitions: Regime Strategies and the Structuring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Tunisian and Egyptian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8, No. 1 (October 2015), pp. 1-23.

^② Crane Brinton,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65.

中，“革命联盟”形成与分裂属于政治联盟的一种，在这一类联盟中，联盟本身的规模控制在多大程度一直是这一转型进程中各方博弈的焦点。根据目前政治学中“政治联盟形成”和“政治生存逻辑”等理论，^① 在政治运动后形成的联盟中，极有可能出现一种“最小化联盟”的取向，这一取向试图将权力集中在一个少数群体的手中，并且排斥联盟内其他人对于权力的分享。在出现最小化联盟的取向后，联盟内部那批没有获得权力的参与者，就会因为对自身权力地位的不满，而产生失望、并出现以权力斗争为主要矛盾的分裂。在本文中，权力冲突的矛盾被操作化为民主支持度变量。这一变量测量了相关政治运动参与者对于民主制度的支持程度。对民主制度的支持与否反映了运动参与者对于权力分享范围的不同理解，对民主制度更为支持的参与者说明其支持更为包容的权力分享制度，而反对威权和权力垄断。而对民主制度更不支持的参与者，则希望其可获得更为垄断和威权的权力，其与前一批支持者难以相容。因此，本文的第一个假设认为，在运动结束后，“革命联盟”参与者对于民主制度支持程度的高低会显著影响“革命联盟”内部的失望认知。

假设 1（权力斗争）：在政治运动胜利后，不同的民主支持度与参与者的失望认识有着显著的影响。

2. 经济冲突

在经济冲突上，这里主要是指“革命联盟”内部因为物质利益分配不均而形成的冲突。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在运动胜利后，“革命联盟”将因各种利益的矛盾而分裂。^② 而在目前的关于转型的讨论中，转型中出现的再分配冲突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影响转型结果的重要冲突形式。^③ 革命胜利对于参与运动的普通参与者而言，除了旧制度的消亡，还需要新制度满足其分配需求。而在“革命联盟”的范畴下讨论这一问题，可看出这里的再分配冲突可分为两种，首先是“革命联盟”中收入较高、具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阶层，可能对政治运动之后过激的再分配政

^① William Riker,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lastair Smith,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James D. Morrow,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

^②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Boston: Addison-Wesley, 1978, pp. 201-250.

^③ 对于分配性冲突与批评，可参见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No. 4 (September 2001), pp. 938-963;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Dictators and Democrats: Mass, Elites and Regime Chan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策不满，而出现对政治运动结果的失望。其次是在“革命联盟”中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则可能因为再分配政策不均，而产生分歧与矛盾。当然，这两种分配性冲突在经验上都可反映为在新政权后经济地位降低（或者没有提升）的情况，故而在经验上可以归为一类讨论。在本文中，此变量被操作为参与者自身的经济地位变量。根据经济冲突的理论，运动后不同的经济和收入情况是新政权再分配结果的体现，而这与参与者是否会产生对运动的失望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运动后依然处于经济生活地位较低的参与者，其一般会对运动的胜利产生相当程度的失望。

假设 2（经济冲突）：在政治运动胜利后，经济地位越低，其对于运动产生的失望概率也会越高。

3. 理念冲突

理念冲突是指“革命联盟”内部因为意识形态等理念性因素而爆发的矛盾。此冲突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世俗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宗教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在本文讨论的具体情境中，理念冲突被具体化为世俗派与政治伊斯兰之间的矛盾。在中东国家建构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政治伊斯兰势力与相应的世俗力量之间在理念上的冲突一直是一个被高度政治化的敏感议题。由于政治伊斯兰势力作为宗教性政治势力，故而其提出的政治方案会被其他政治势力担忧其试图改变政体性质，将教法作为国家执政的根基，并建立神权国家。故而，在中东政治中，对于政治伊斯兰建立神权国家的恐惧，长期以来都是这些国家政治发展因素的重点，既有研究认为在中东国家推动民主化运动，如何处理好对于政治伊斯兰势力的恐惧和排斥是能否建立民主的关键。^① 故而，本文将政治伊斯兰作为第三个核心自变量。政治伊斯兰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故应采取更为细致的讨论，分析政治伊斯兰对本研究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具体维度，以把握其内在的差异性。本文尝试对“政治伊斯兰”这一变量进行分类，将其区别为：政策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和政权伊斯兰等三个子变量。

政策伊斯兰是指相关民众认为国家的部分法律和相关公序良俗的规定应该包含一定的伊斯兰内容，以伊斯兰教法来规定国家有关的公序良俗。不过，在此方面政治伊斯兰的立场并没有涉及相关的权力分配等内容，并非一定要建立起伊斯兰政党或伊斯兰教士主导的政治体制。在此处，政策伊斯兰与相关反对力量冲突的主要焦点在于国家相关政策伊斯兰化，和人们日常生活与行为准则的伊斯兰化（例如女性

^① Lisa Blaydes and James Lo, “One man, One Vote, One Time? A Model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24, No. 1 (January 2012), pp. 110-146.

着装、相关娱乐行为是否允许等)。反对势力认为政策伊斯兰化的行为可能是相关政治伊斯兰势力对于人们正常生活的干预,妨碍了人们自由的选择权利,而在政策伊斯兰方面则认为这是对体现其伊斯兰公序良俗的一种方式,故而形成矛盾与冲突。

政党伊斯兰是指政治伊斯兰势力通过伊斯兰政党参与政治的行为。在此,相关政治伊斯兰势力会希望代表其利益的伊斯兰政党参与政治竞争过程并执掌政权,在这里政党伊斯兰所引发的争议主要体现为革命后伊斯兰政党和世俗政党之间的竞争与双方支持者的选边站队。不过,政党伊斯兰虽然涉及伊斯兰政党的执政,但不一定代表了其要谋求国家政权的伊斯兰化,因为宗教性政党参与民主政治本身也是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出现的正常现象,例如西欧许多发达民主政体也存在着如基督教民主党类似的宗教性政党。^①

政权伊斯兰是指政治伊斯兰势力谋求在国家政权中加入伊斯兰成分,包括对于宪法伊斯兰化的修订、国家组织形式中的伊斯兰化改造等。故而在此阶段,政治伊斯兰引发的矛盾涉及国家政权核心层面,通常与制度变革有关。相比较于政策伊斯兰与政党伊斯兰,持政权伊斯兰看法的参与者可能具有更强的激进诉求。

根据以上分析,证明三个变量组成的政治伊斯兰会成为显著影响参与者失望的因素。

假设 3 (理念冲突): 在政治运动胜利后,不同政治伊斯兰对参与者的失望认识有着显著的影响。

(二) 假设检验与经验数据的关系

在下文中,本文将使用“阿拉伯民主晴雨表”的数据,对以上三个假设在实践中的情况进行考察。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用经验数据对假设的考察,其目的在于进行描述性推断。所谓描述性推断就是使用可观察的微观层面的数据,对更宏观层面不可观察的内容进行推断。本文对以上三个假设的判断标准是,当数据中某个假设的相应变量呈现出显著性的影响,并且在系数是具有统计学意义时(也即系数不是为 0),便判断在此案例中存在着这一类型的冲突进程。而如果不存在,则说明在此案例中不存在这一类的冲突进程。例如,如果在埃及案例中我们发现政治伊斯兰三个变量都对参与者失望的影响不显著,而经济地位的有关变量呈现出显著的特点时,便可认为在埃及的案例中存在经济冲突,而不存在理念冲突。因为本文属于描

^① 对于新型民主国家的宗教性政党研究,可参考 Stathis N. Kalyvas, “Commitment Problems in Emerging Democracies: The Case of Religious Part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2, No. 4 (July 2000), pp. 379-398.

述性推断，其目标在于发现具体案例的特点，并非证伪理论。而且正如后文所发现的那样，在不同的案例中，与参与者失望有关的冲突形式并不相同，故而即便某一个假设在一个案例中得不到证明，也并不能证伪该理论。

在以上三个假设中，除了第二个经济冲突外，并没有假设直接讨论相关变量与参与者的失望概率之间究竟是正向关系还是负向关系。这是因为根据本文理论，只要相关自变量与参与者失望概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关系，那即可以说明此变量对革命参与者的失望情绪存在影响，而其具体的影响方向则需要结合当时不同政治势力之间具体的博弈形势考虑。以民主支持度为例，只要在经验数据中出现此变量的显著性，那么就说明在此“革命联盟”中存在着以支持民主为核心的权力共享参与者与反对民主的权力垄断参与者之间的分裂。而当此变量呈现出正向关系时，这就说明，当时在权力斗争中，支持民主的势力正处于政治竞争的优势地位，而“后革命时期”国家的政治发展正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而如果此变量是负向关系，则说明当时国家政治生态朝着威权化方向发展。同样，在三个政治伊斯兰变量中，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对参与者的失望产生显著影响，就意味着该联盟中存在着理念的冲突，但是具体哪一个出现显著性影响，并且发生方向变化，则反映了当时理念冲突所围绕的主要议题以及政治伊斯兰与反对政治伊斯兰的相关政治竞争结果。例如，在政治运动胜利后，如果政治伊斯兰势力着重推动政策伊斯兰化和促进政党参政时，相应的政策伊斯兰与政党伊斯兰就会对参与者的失望产生显著影响（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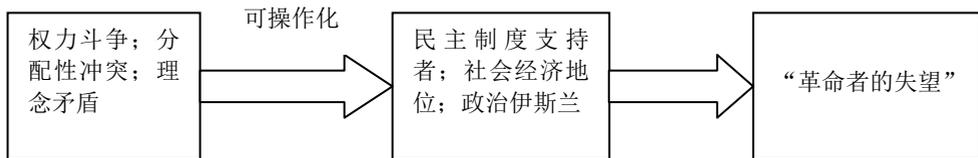


图1 本文理论示意图

三 数据、变量和假设与模型设计

为分析权力冲突、经济冲突和理念冲突三大假设，本文将选取“阿拉伯民主晴雨表”数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利用其中涉及“阿拉伯之春”参与的有关数据，对本文提出的政治伊斯兰、民主认同度和社会经济地位等三个主要变量对参与者对革命结果失望情绪进行定量回归性分析。该数据库是国际上知名的对西亚北非国家

的大规模民意调查，主要内容涉及政治方面，已经进行了四轮调研，是目前研究阿拉伯和中东政治中常用的民意调研数据库。^① 本文选取了埃及和突尼斯两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这里主要是考虑到，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实现了政权更迭的国家，也即符合本文所说的“革命”的标准要求，但是由于埃及和突尼斯基本都是依靠非暴力的方式获得政治运动胜利，而利比亚则是通过武装斗争并在外部干预的支持下取得胜利，因此，埃及和突尼斯有更多的可比性，利比亚目前基本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故其数据本身的可信性也值得怀疑。本文所采取的数据是“阿拉伯民主晴雨表”第三波的数据，该数据调研于 2013 年年初（也即在埃及和突尼斯都出现相应的政治冲突前夕），这时间的调研数据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埃及和突尼斯参与过 2011 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参与者对于此次运动的真实反思。

（一）相关变量测量和数据来源

1. 因变量

本文采取的主要因变量是“革命者的失望”，这里选取了“阿拉伯晴雨表数据库”中第 800a 和第 810a 两个问题，在第 800a 问题中，其询问了相关受访者中是否参与了“阿拉伯之春”政治运动，根据此问题，确定了主要研究的样本范围，在埃及 1 196 名受访者中，有 196 名受访者宣布参与过“阿拉伯之春”，而在突尼斯 1 199 名受访者中，有 223 名受访者参与过“阿拉伯之春”。在确定样本范围后，选取了数据库中的第 810a 问题，该问题询问受访者觉得“阿拉伯之春”对其自身而言更多是胜利还是损失。在原始的问卷中，共有三个选项，分别为“更多是损失”（more of a personal loss）、“不好说”（hard to define）、“更多是个人获利”（more of a personal victory）等三个选项。由于本文讨论的核心因变量是“革命者的失望”，故而将原有的数据进行重新编码，将结果变成一个二分变量，分为失望（“更多是损失”赋值为 1）与不失望（“不好说”与“更多是个人获利”，赋值为 0）。需要说明的是，此变量如果不考虑具体情景，可以进行两方面解读。相关受访者对此问题的回答可以进行两方面的解读，首先，此问题的答案可以理解为反映了受访者对“阿拉伯之春”本身的看法，其次，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可理解为反映受访者对于“后阿拉伯之春”各种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看法。就本文而言，第二种看法无疑与本文主题更加匹配。因此，从区分这两种看法的角度出发，决定将研究样本限定于参与运动的民

^① Arab Barometer, <http://www.arabbarometer.org>.

众。本文认为当时主动参与“阿拉伯之春”的民众一般不会是极其厌恶或者反感此类行动的民众，故而其对于运动后结果的收益评估，一般而言就是对“后革命时期”发生情况的收益评估，如果本研究将支持运动与反对运动的民众都包括在其中，反而难以识别出运动后政治发展局势与那批先前支持运动、但随后又开始感到失望的民众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一限定也使得本文的数据数量的确不够理想，但是基于该数据库是在埃及和突尼斯进行随机抽样，并且在任何政治运动中，直接参与人数相对于人民总体都是少数的人，故而，在没有更理想数据的情况下，本文依然将使用此数据作为其样本。

2. 自变量

根据假设，本文的因变量为民主支持度、经济阶层地位和政治伊斯兰，因此，也将选取数据库中的相关问题作为对以上这些变量的测量。在民主支持度上，将选取数据库中的第 5171 号问题，此问题询问了受访者对于相关政治制度的看法，其中一个问题分析了受访者对于民主制度的支持程度，并按照民众对这一类型的认可程度分为四个层次，故而本文将直接在此基础上，使用此变量作为对民主支持度的测量。在此问题中，本文对民主制度有一段比较复杂的描述，从而确定受访者理解其所提到的民主制度的定义。

在经济地位上，本文以收入情况作为判别参与者自身经济地位的变量。而对于此变量，虽然在数据库中有直接询问受访者经济收入的问题，但是本文并没有使用这一变量。主要原因是：首先，这一问题直接询问受访者的收入情况，要求其将个人年收入的数值汇报给访问者，故而有较强的敏感度，研究者怀疑此问题答案的可靠性。其次，这一问题只是询问了个人的收入情况，但是这与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没有直接关系。故而在此变量上，本文选取了第 1016 号问题，在此问题中，其直接询问了受访者对自身家庭情况的评估，让其评估家庭收入与满足日常需求的直接关系，其回答分成四个维度，从家庭收入完全可以满足日常开销并且有存款，到家庭收入不能满足日常开销。本文以此四个维度分析受访者的收入情况。同时本文也有选择地采取了既有类似“革命联盟”研究中对于阶级地位的判定，^① 根据其就业和职业情况（第 1004 号和第 1005 号问题），将参与者分成有职业者和失业者两大类，从而更好地测量参与者的政治经济地位。

^① Mark Beissinger, Amaney Jamal and Kevin Mazur, “Explaining Divergent Revolutionary Coalitions: Regime Strategies and the Structuring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Tunisian and Egyptian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8, No. 1 (October 2015), pp. 1-23.

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在数据库中有专门的一个板块涉及相关宗教问题，其中存在一系列涉及伊斯兰参与政治的相关问题和指标。这些指标为测量本文提出三类不同的政治伊斯兰提供了有利依据。在本研究中，政策伊斯兰将使用第 6052 号问题，这一问题询问受访者对“国家和政府制定法律应该符合伊斯兰教义”这一陈述的同意程度，并根据其同意程度判断其自身的立场情况。政党伊斯兰这一变量将使用第 605a 号问题，这一问题让受访者在伊斯兰政党和世俗政党两者中选其一，从而分析相关受访民众对于伊斯兰政党的偏好。而政权伊斯兰将使用第 6062 号问题，该问题询问受访者对“允许伊斯兰宗教领袖直接在政府中任职”这一陈述的判断，根据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同意程度判断受访者对这一问题的态度。笔者在数据对埃及和突尼斯两国的三类政治伊斯兰维度进行了相关性检测，相关情况可参考本文附录。^①

3. 控制变量

在本文中，除了以上变量，还包括对类似研究常用的变量进行控制，如教育、性别、年龄等三个控制变量。在数据库之中，也有直接衡量教育（第 1003 号问题）、性别（第 1002 号问题）和年龄（第 1001 号问题）的相关问题，可直接使用。

表 1 变量与问卷相关问题

变量汇总表		
变量名	问题编号	问题内容
“革命者的失望”	q810a	您认为参与过“阿拉伯之春”后更多是个人的胜利还是损失？
民主支持度	q5171	您如何看待一个确保公共自由、政治社会权利平等、政权更替、行政权威有问责性的民主政治体制
个人收入情况	q1016	我将询问一些涉及您家庭收入的问题：a.我家庭收入满足我的开支没有任何困难，且有存款；b.我家庭的收入满足我的开支基本没有问题；c.我家庭的收入满足我的开支有点困难；d.我家庭的收入满足我的开支非常困难
是否就业	q1004; q1005	您是否有工作，您属于哪一类的失业者（选取其中的学生和求职者）
政策伊斯兰	q6052	您是否同意国家和政府制定法律需要参考伊斯兰教义
政党伊斯兰	q605a	您是否支持伊斯兰政党参与政治
政权伊斯兰	q6062	您是否支持伊斯兰教士直接在政府中任职
教育程度	q1003	您的教育程度
年龄	q1002	您的年龄为多少
性别	q1001	您的性别是什么

① 本文附录可联系本文责任编辑获取。责任编辑电子邮箱：croton1985@163.com。

4. 模型

因为本文的因变量为 0-1 变量, 故而采用了逻辑斯特的模型,^① 将相关失望的概率转化为一个连续性的逻辑斯特统计量, 并使用广义线性模型的方式进行回归。本文将所采用的数据库分为埃及和突尼斯两个部分, 在每个部分各采用了基准和控制变量两个模型。基准模型只包含三个主要变量(政治伊斯兰、经济社会地位、民主支持度), 控制变量模型包括了本文所加入的各类控制变量。由于政治伊斯兰有三种形式, 故而分别以三类不同的政治伊斯兰变量作为相关指标代入本文所讨论的基准和控制变量模型, 所以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分别拥有了六个模型。本文所讨论模型的数学形式和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见表 2 和表 3。需要说明的是, 根据表 2 和表 3 的显示, 在本文的相关数据中存在一定的缺失值, 在本文的模型中, 直接采取了统计软件默认的删除缺失值的处理方式, 这样的好处是保持了数据本身的特性, 但是, 简单的删除并不是处理缺失值最好的方法, 为此采取了多重估计(multiple imputation)的统计方法来将缺失值模拟补充, 不过由于这一补充后“完整”的数据库在相关系数和显著性和目前的模型没有本质差异, 故而将此表放入附录来处理。

表 2 埃及相关变量统计表

统计量	数量	平均数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革命者的失望”	145	0.4	0.5	0	1
民主支持度	160	3.6	0.6	1	4
收入情况	157	2.1	0.9	1	4
是否失业	161	0.3	0.4	0	1
政策伊斯兰	155	3.0	0.9	1	4
政党伊斯兰	134	2.2	1.1	1	4
政权伊斯兰	158	1.9	1.0	1	4
教育程度	161	4.9	1.2	1	7
性别	161	0.8	0.4	0	1
年龄	161	36.0	11.5	18	68

① 对于本文相关模型和数据的检测的问题, 可参考本文的附录。

$$Pr(\text{失望} = 1|x, \beta) = \log\left(\frac{Pr(\text{失望})}{1 - Pr(\text{失望})}\right) = \frac{1}{1 + e^{-\beta^T x}} \quad (1)$$

(x = 数据, β_i = 参数)

$$\text{基本模型: } \text{logit}(Pr(\text{失望概率}))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beta_3 x_3 \quad (2)$$

(β_1 = 民主支持度, β_2 = 经济社会地位, β_3 = 政治伊斯兰)

$$\text{完整模型: } \text{logit}(Pr(\text{失望概率})) = \begin{bmatrix} \beta_1 \\ \vdots \\ \beta_i \end{bmatrix} * x_i + \begin{bmatrix} \theta_1 \\ \vdots \\ \theta_i \end{bmatrix} * x_i \quad (3)$$

(β_i =主变量: 民主支持度、社会经济地位、政治伊斯兰; θ_i =控制变量年龄、性别、教育)

表 3 突尼斯相关变量统计表

统计量	数量	平均数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革命者的失望”	219	0.2	0.4	0	1
民主支持度	222	3.5	0.8	1	4
收入情况	221	2.2	1.0	1	4
是否失业	223	0.5	0.5	0	1
政策伊斯兰	220	2.6	1.0	1	4
政党伊斯兰	180	2.9	1.2	1	4
政权伊斯兰	216	2.1	1.0	1	4
教育程度	223	3.8	1.3	1	6
性别	223	0.8	0.4	0	1
年龄	223	36.5	13.4	18	79

四 分析结果说明

首先, 本文展示了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出现失望情绪参与者的数量和比例统计。从统计数据来看, 在埃及, 参与者失望的比例要比突尼斯更高, 在埃及有 54 名参与过运动的人士表示, 其对政治运动后的结果感到失望, 占其总体比例的 38%。在突尼斯, 则有近 50 名参与过运动的人士表示对运动感到失望, 占其总体比例的 23%。从该统计情况来看, 在埃及和突尼斯都出现了一定的参与者联盟内部的失望情绪, 但是相对而言, 突尼斯较少的参与者对这场运动感到失望。接下来, 我们对埃及和突尼斯的参与者分裂的情况与相关变量的关系进行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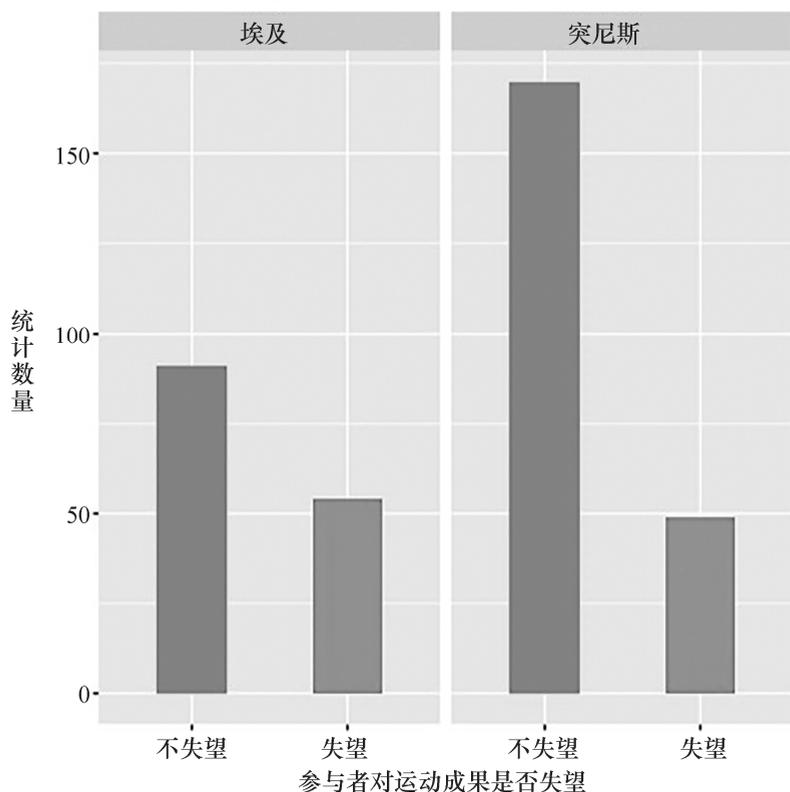


图2 埃及、突尼斯革命联盟内部失望情绪示意图

(一) 埃及参与者失望的分析结果

对埃及统计相关结果的分析。从模型总体的偏差度 (deviance) 来看, 采取的基本模型和完整模型在偏差度上差距不大, 这说明对于此模型的解释主要由以上三个核心变量承担。对于具体系数的解释可看出, 在埃及, 参与者的失望主要体现在民主政治和政治伊斯兰变量维度。在民主支持度上, 根据表 4 的相关统计, 在埃及所涉及的六个模型中, 民主的支持度在所有模型中 (包括控制变量与不包括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都具有显著的影响效果, 均呈现出了负面影响因素。这说明当埃及“阿拉伯之春”的参与者拥有更强的民主支持度时, 更容易对当前政治运动后的政体产生不满和失望的情绪。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是逻辑斯特模型, 因此直接对其系数的解读并不能直观地帮助读者了解此模型系数对因变量的影响。本文还采取了转化的方式, 将模型中相关自变量对于因变量概率的影响直观呈现出来, 根据本文的研究, 当民主支持度从低到高上升的过程中, 相关受访者对于“革命”结果产生失望的概率最多可提升 20%。将这一证据与调研时期 2013 年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可发

现这一判断非常直观地显示出当时埃及在运动之后所出现的主要矛盾，就是许多参与运动的民众认为新上台的穆尔西政权采取了缺乏包容性的政策，试图将政权垄断到穆斯林兄弟会手中，从而引发了当时因为民主而参与“阿拉伯之春”的那一批群体民众的不满。

表 4 埃及数据统计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政权伊斯兰	-0.43**	-0.40**				
	(0.20)	(0.20)				
政党伊斯兰			-0.00	0.07		
			(0.19)	(0.20)		
政策伊斯兰					-0.08	-0.09
					(0.21)	(0.22)
民主支持度	0.72**	0.78**	0.70*	0.80**	0.80**	0.89**
	(0.35)	(0.36)	(0.37)	(0.39)	(0.35)	(0.36)
失业群体	0.17	-0.05	0.39		0.30	0.29
	(0.41)	(0.55)	(0.46)		(0.41)	(0.56)
收入		-0.25		-0.09		-0.23
		(0.22)		(0.24)		(0.22)
教育情况		-0.04		0.06		-0.03
		(0.18)		(0.21)		(0.18)
年龄		-0.01		0.00		-0.01
		(0.02)		(0.02)		(0.02)
性别		-0.18		-0.19		0.07
		(0.56)		(0.53)		(0.58)
AIC	184.00	185.50	161.31	165.18	180.92	182.27
BIC	195.79	208.92	172.52	190.19	192.63	205.52
Log Likelihood	-88.00	-84.75	-76.65	-73.59	-86.46	-83.14
偏差	176.00	169.50	153.31	147.18	172.92	166.27
案例数量	141	138	122	119	138	135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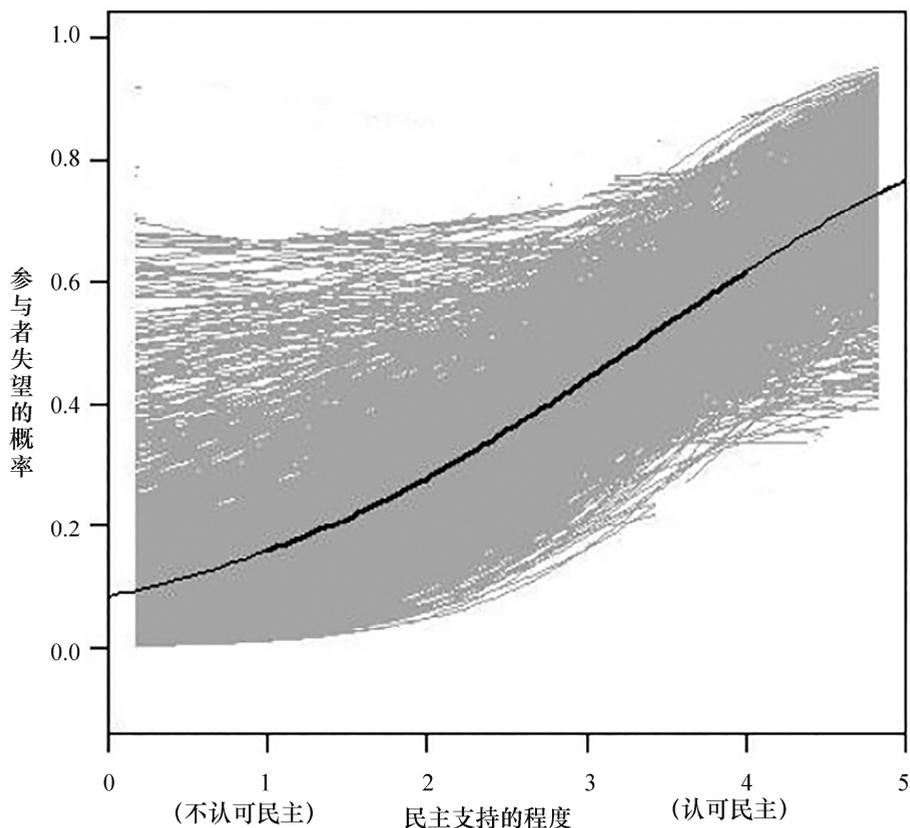


图3 埃及民主支持度对参与者失望概率的影响

第二，埃及的统计数据同样表明，本文对政治伊斯兰采取的三种分类对于我们理解“革命联盟”的分裂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数据表明，在三种形式的政治伊斯兰中，主张伊斯兰教士直接参与国家政权的政权伊斯兰与其他两项政治伊斯兰，对参与者失望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从显著性上分析，在95%显著性范围上，只有政权伊斯兰呈现出显著的取向，而其他两项政治伊斯兰并没有呈现出类似关系。从系数本身解读，政权伊斯兰与参与者的失望之间呈现出负向关系，即越支持这一立场的群体，就越会认为这一场政治运动是一次成功。而在政权伊斯兰的模型中，其对参与者失望的概率的影响体现了典型的单调递减的趋势，在政权伊斯兰的支持度从1（最低）上升到4（最高）的过程中，相应支持者对于运动结果的失望程度也将随之降低15个百分点。而在政策伊斯兰和政党伊斯兰中，其系数都没有呈现出类似关系。其对于参与者失望的概率影响在图形上显示基本都是一条平直的线条，体现出其没有关系（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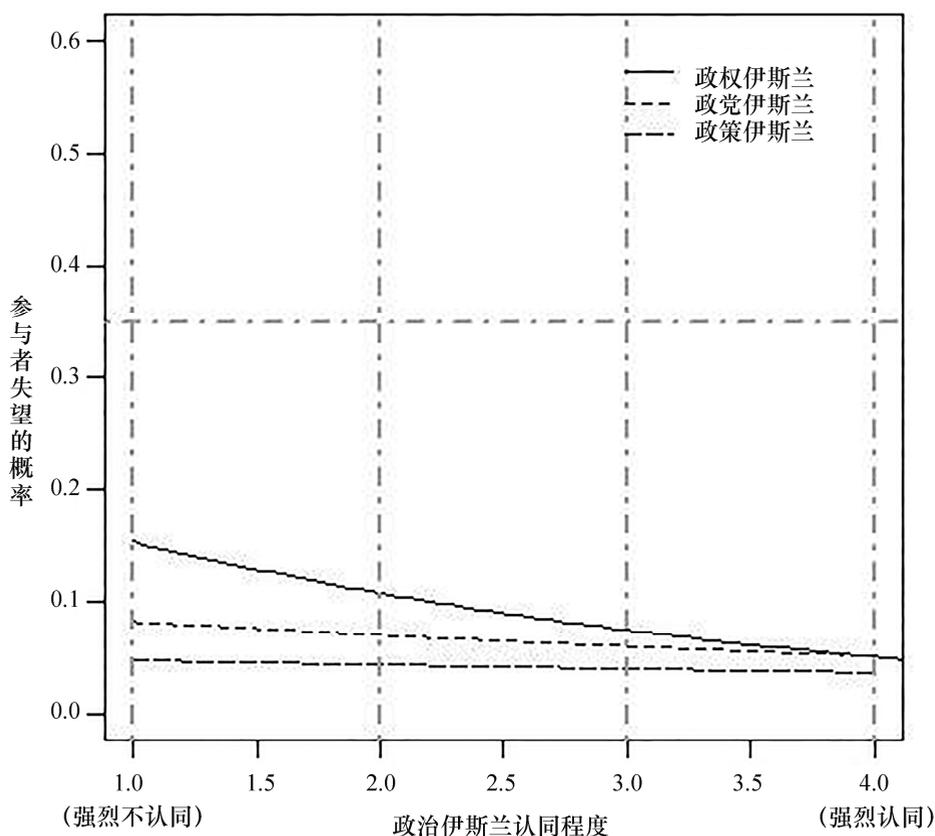


图 4 埃及三种不同的政治伊斯兰对参与者失望概率的影响

第三，将埃及变量中的民主支持度和政权伊斯兰两个变量进行比较（见图 5），可以看出其出现明显的拉锯效应，将表中的以上两项变量使用“绳梯图”(rope ladder plot) 的方式呈现出来，可发现民主制度和政权伊斯兰呈现出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而这其实也反映出当时埃及的“革命联盟”中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极化现象。一方面，渴望伊斯兰势力直接获得政权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是当时穆尔西政府的支持力量，这说明其对当时穆尔西政府不顾国内反对，强制推动反映伊斯兰立场的立宪和政府安排的支持，是当时政府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这一力量所推动的伊斯兰化变革遭到了其他群体的反对，而这一反对主要是由于支持包容性政治进程的支持自由民主力量。因此当时埃及的“革命联盟”分裂并不是简单的政治伊斯兰与世俗派之间的分裂，而是政治伊斯兰中支持伊斯兰直接掌控政权的强硬势力与支持政府扩大政权参与度与包容度政权的民主政治势力之间的分裂与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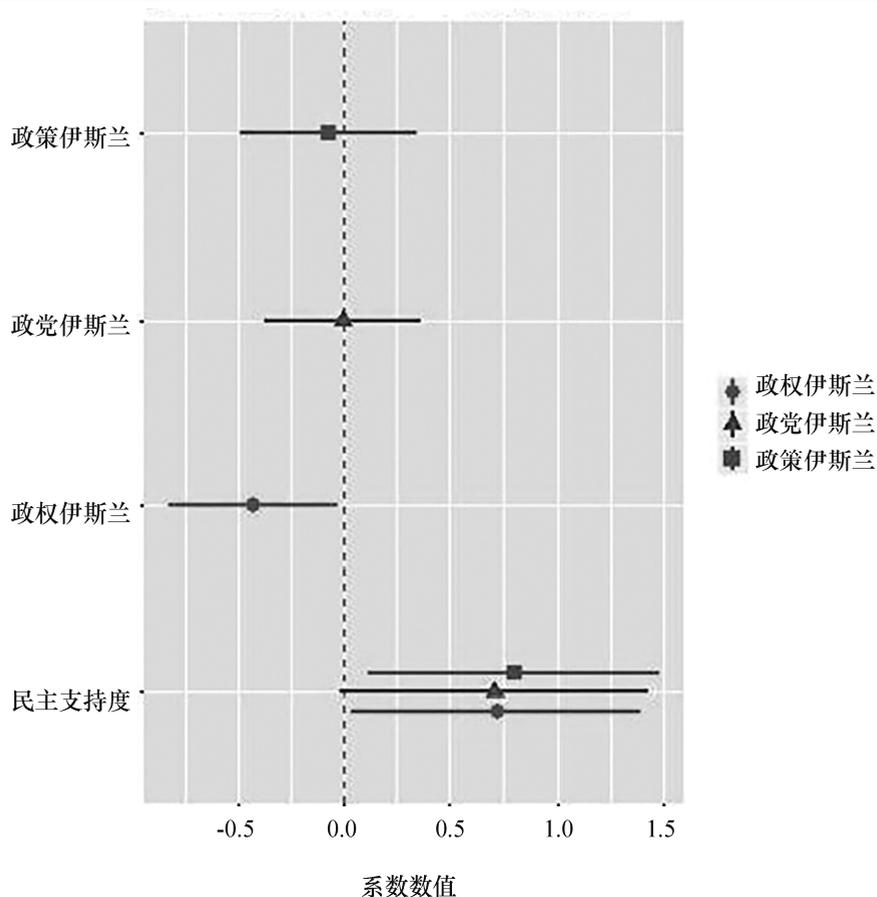


图5 埃及民主支持度与政治伊斯兰系数对比图

(二) 突尼斯参与者的失望分析结果

与埃及类似，突尼斯的六个模型从总体的偏离度来看，基准模型与控制模型差距不大，说明相关控制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不大。根据以上数据中的系数可发现，突尼斯的案例与埃及的案例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经济类的相关矛盾是影响该国“革命同盟”产生失望情绪的重要变量。在较为简化的基准模型中，代表这一经济地位的失业群体与最终产生的“革命失望”的概率之间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当一个“阿拉伯之春”的参与者在运动后没有获得相应的工作，其会对运动是否胜利这一判断产生相当大程度的失望情绪。在更为复杂的控制模型后，可发现控制模型中的收入水平也呈现出显著特点，并且在模型中与因变量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这说明，当一个运动参与者的个体收入越低时，其越会对运动后的成果产生失望情绪。因为失业与否是一个二分变量，故而本文将收入水平与失业与否合并使

用可视化。可以发现，没有工作的参与者对于运动的失望程度要比有工作的参与者的失望程度高出了 20%。但同时，在失业和非失业两个群体之中，收入对参与者的失望都呈现出了明显负相关作用。收入的水平提高，可以使得参与者的失望程度降低 20%（见图 6）。

表 5 突尼斯数据统计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政权伊斯兰	-0.20	-0.22				
	(0.18)	(0.19)				
政党伊斯兰			-0.49***	-0.52***		
			(0.16)	(0.17)		
政策伊斯兰					-0.36**	-0.35*
					(0.17)	(0.18)
民主支持度	-0.43*	-0.44*	-0.49**	-0.52**	-0.40*	-0.40*
	(0.22)	(0.23)	(0.23)	(0.23)	(0.21)	(0.21)
失业群体	0.82**	0.74*	0.86**	0.56	0.81**	0.73*
	(0.34)	(0.43)	(0.37)	(0.46)	(0.34)	(0.44)
收入		-0.36		-0.36*		-0.35*
		(0.19)		(0.20)		(0.19)
教育情况		0.07		-0.02		0.02
		(0.15)		(0.16)		(0.15)
年龄		-0.00		-0.01		-0.00
		(0.02)		(0.02)		(0.02)
性别		0.30		-0.25		0.39
		(0.44)		(0.47)		(0.44)
AIC	226.49	228.58	190.27	193.15	225.78	228.17
BIC	239.92	255.36	202.95	218.43	239.27	255.06
Log Likelihood	-109.25	-106.29	-91.13	-88.58	-108.89	-106.08
偏差	218.49	212.58	182.27	177.15	217.78	212.17
案例数量	212	210	176	174	215	213

注：*** $p < 0.01$, ** $p < 0.05$, * $p < 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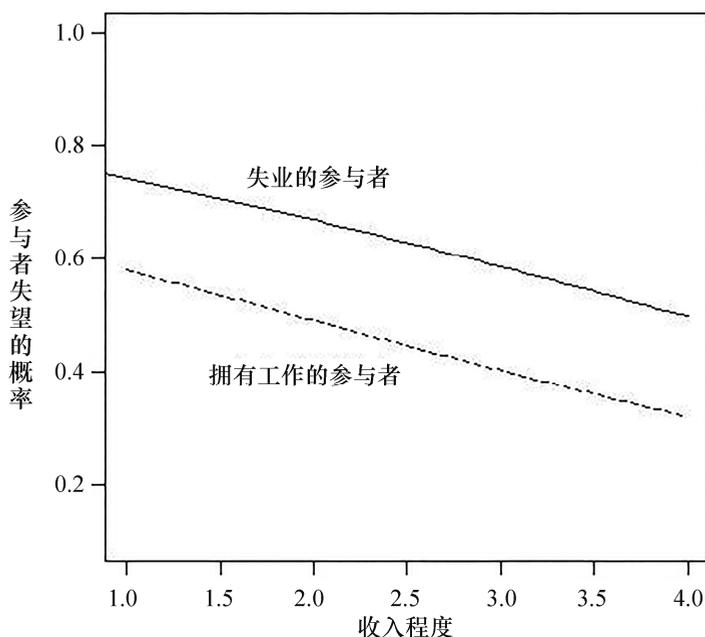


图6 突尼斯经济地位变量对参与者失望概率的影响

在突尼斯的案例中，政治伊斯兰所起的作用与埃及的政治伊斯兰在方向上呈现基本一致的特点，但是在其种类上则呈现出较为不相同的特点（见图7）。首先，在影响的方向上，突尼斯的政治伊斯兰也呈现出了越支持政治伊斯兰就越对支持运动成果感到满意的情况。不过在产生显著影响的维度上，在突尼斯，认可政策伊斯兰与政党伊斯兰的相关参与者具有更高的概率认为本次运动取得了胜利。根据表5中的数据可发现，在涉及突尼斯的六个模型中，政策伊斯兰与政党伊斯兰的变量在相关的模型（模型三、四、五、六）中都呈现出了显著的负相关效应，而代表政权伊斯兰的模型则没有相应的显著性。从概率的角度进行测算可发现，这两类政治伊斯兰的态度每上升一个单位，会导致参与者对“革命”结果产生失望的概率下降大致20%，而政权伊斯兰对于这一概率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大约10%左右）。

在突尼斯的案例中，在民主制度上，基本保证了每提升一个单位的民主支持度，可使参与者失望的概率下降最多10%左右。而在政治伊斯兰层面也与民主支持度保持了一致方向（见图8）。这与埃及呈现出了并不相同的特点，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突尼斯在后“阿拉伯之春”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民主制度的建设推进相对较为深入，从而得到了民主派的支持；而在埃及，由于民主制度的推进受到阻碍，从而使得支持民主的参与者对运动结果更为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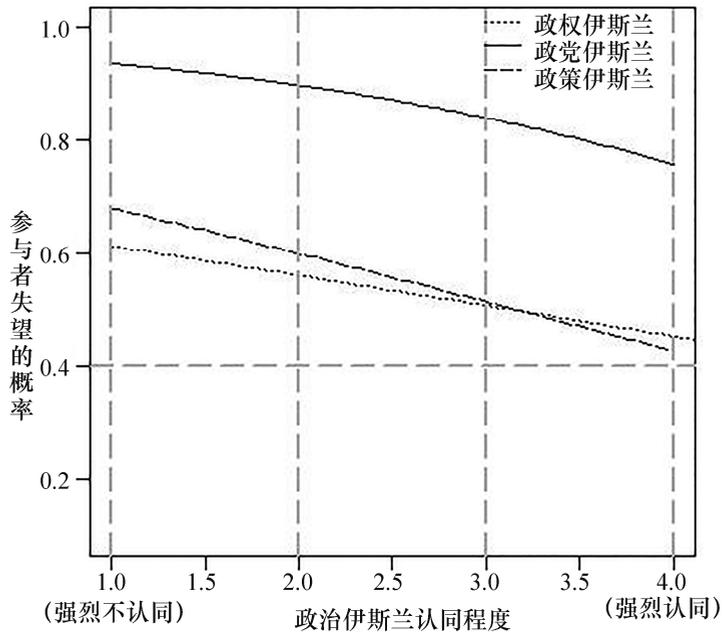


图 7 突尼斯三种不同的政治伊斯兰对参与者失望概率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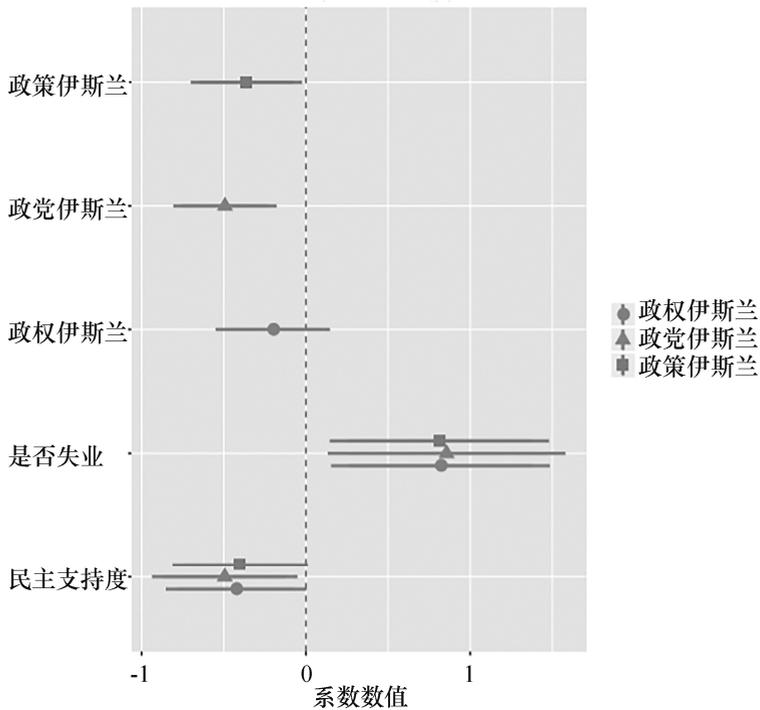


图 8 突尼斯民主支持度、政治伊斯兰和经济地位系数对比图

(三) 案例总结：微观视角下埃及与突尼斯革命联盟的分裂

根据以上案例研究可发现，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参与“阿拉伯之春”的进程中，“革命同盟”内部都出现了“革命者的失望”的现象，并且在两个案例中，“革命者的失望”都与民主支持度和政治伊斯兰等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故而表明在此两国的“后革命政治”中，针对权力和理念的相关冲突都是影响其“革命联盟”分裂的主要矛盾。但是在埃及和突尼斯两案例中依然在民主支持度的影响方向、政治伊斯兰产生分化具体维度和经济地位变量上存在着差异，体现了两国“革命联盟”内部产生失望情绪的不同性质，也体现了两国在“后革命时期”“革命联盟”分裂的不同特点。

第一，埃及和突尼斯这两个案例在共性上民主支持度和政治伊斯兰的相关变量都呈现了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在两国的“后革命时期”，支持权力多元共享的参与者和支持权力垄断的参与者，支持政治伊斯兰的支持者与反对政治伊斯兰化的参与者之间，对政治运动胜利的乐观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在观念上，以上两组矛盾使得埃及与突尼斯“革命联盟”中参与者形成了不同的阵营并相互竞争，从而使得埃及与突尼斯“革命联盟”分裂都呈现出了权力斗争与理念冲突两种形式。而这一微观层面的发现也与宏观层面对埃及与突尼斯“后革命时期”的讨论一致。在“阿拉伯之春”后，埃及和突尼斯都出现了伊斯兰政党获得政治主导权的情况。在埃及，政治伊斯兰的主要代表力量穆斯林兄弟会在运动后第一次议会选举中赢得了议会中70%的议席，^①而在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赢得了议会选举中39%的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②但在这两党执政之后，突尼斯和埃及都出现了“革命联盟”内部对其试图垄断权力的担忧。在埃及体现为穆斯林兄弟会主动疏远与其他革命派别的关系，强调自身与军队的关系，并试图利用埃及既有的强力部门强化统治的问题。^③而在突尼斯，虽然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与另外两个世俗派政党组成了“托里卡”（Troika）政治联盟，做出了分享权力的姿态，但这一联盟内部迅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极化现象，而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也被其盟友指责为不重视民主转型，而只

^① David Kirkpatrick, “Islamists Win 70% of Seats in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2/01/22/world/middleeast/muslim-brotherhood-wins-47-of-egypt-assembly-seats.html>.

^② “Ennahda Move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nahda_Movement#2011%E2%80%93932014_Troika_government.

^③ Neil Ketchley, *Egypt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78-102.

关注控制国家机构和强力部门。^① 并且,其他世俗派盟友担心伊斯兰政党要对国家实行极端的伊斯兰化。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长期的统治结构导致其决策受到党内的穆斯林兄弟会高层的控制,被其他世俗派视为由影子政府控制。^② 而在突尼斯,由于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始终不能与极端的萨拉菲势力完全切断关系,^③ 故而,其他政党也担忧该党存在激进伊斯兰化的问题。通过对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宏观层面政治进程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运动支持者对运动的失望的影响因素也是两国宏观政治进程的反映。

第二,两个案例也呈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差异性,这可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民主支持度上,在埃及和突尼斯的案例中,民主的支持度都成为了具有显著性的变量,但是在以上两个案例中,民主支持度呈现出两种不同方向。在埃及案例中,民主支持度呈现出与正向相符合的方向,即越发支持民主的参与者就越对运动的结果失望。但是在突尼斯的案例中,民主支持度呈现出与假设相反的方向,参与运动的支持者中越发支持民主,其也越可能对运动后的结果表示满意。根据前文的讨论,民主支持度对参与者失望影响的方向,与参与者对于政治宏观进程的判断有关。在埃及案例中,民主支持者的运动失望情绪提升,表明当时埃及政治进程中民主化程度严重不足,存在严重的威权政治复苏的倾向。而突尼斯民主支持者运动失望情绪的降低,也体现了当时突尼斯内部虽然政治问题重重,但其民主化依然有所推进。而这两点也与调研时期埃及与突尼斯宏观的政治发展进程相符合。在本次调研进行的时期,埃及与突尼斯政权的民主程度的确存在差异。埃及当时实行总统制的政权,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代表直接控制国家政权,大权独揽。由于当时议会还处于被取消的状态,反对力量并没有任何制度性的渠道来对政策施加影响,故而呈现出非常强的威权主义状态。而在突尼斯,当时依然属于议会制政权,世俗政党依然在政府占据相当的席位,故而其虽然内部矛盾重重,但依然是一个权力分享政权。正如许多相应研究表明的那样,正是由于突尼斯政治运动后在民主进程方面的推进,使其制度具有更多的共享性和灵活性,从而可以帮助其在内部政治冲突极其

① Amel Boubekeur, "Islamists, Secularists, and Old Regime Elites in Tunisia: Bargained Competition,"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21, No.1 (October 2015), pp. 1-21.

② Khalil al-Anani, "Upended Path: The Rise and Fall of Egypt's Muslim Brotherhood,"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9, No. 4 (October 2015), pp. 527-543.

③ Farida Ayari, "Ennahda Movement in Power: A Long Path to Democracy," *Contemporary of Middle East Review*, Vol. 2, No.1&2 (March 2015), pp. 138-139.

严重时，利用制度本身的韧性最终实现妥协，从而实现过渡。^① 总之，本文在微观层面上发现的民主支持度在埃及和突尼斯两个案例中的差异，也与这两个案例在宏观政治进程中的发展相吻合。

其次，在经济社会地位问题上，在埃及，这一变量并没有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影响，反映出埃及的受访者的个人经济高低与参与者的失望之间并没有明显关系。这表明埃及的“革命联盟”内部分裂并不是以经济冲突作为主要矛盾，这也间接说明了埃及“革命联盟”内部的分裂呈现出更为政治化的特点。但在突尼斯，这一变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联系，也体现了与研究假设相匹配的预期，这体现在突尼斯“革命联盟”的崩溃与当时政治运动胜利后人民基本经济与物质生活的改善上。这一点在更为宏观的讨论中也得到了体现，从既有研究中可以发现，在突尼斯案例中，存在着非常强有力的工会体系，从而使得在该国与劳工和经济权益有关的议题成为运动后政治博弈的焦点问题。^②

最后，在政治伊斯兰方面上，埃及和突尼斯虽然都出现了与政治伊斯兰支持度高度相关的“革命”失望情绪，并且都呈现出支持政治伊斯兰的参与者更满意当前的政治形势发展，而反对政治伊斯兰的参与者对运动结果表示失望的情况。但在两个案例中，影响“革命失望”的政治伊斯兰维度并不相同。在埃及，影响“革命失望”的主要政治伊斯兰维度是涉及伊斯兰参与国家政权的政权伊斯兰；在突尼斯，则是政党伊斯兰和政策伊斯兰这两个维度。这种差异性响应了本文对于政治伊斯兰的内部分类，也即不同维度的政治伊斯兰对参与者的失望影响并不相同，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政治伊斯兰与世俗冲突。在埃及，政治伊斯兰的冲突出现在政权伊斯兰的层面，说明当时政治伊斯兰的冲突议题在于国家根本制度的伊斯兰化问题，而如果将此变量与埃及在民主制度上的系数结合起来，可发现埃及的政治伊斯兰冲突呈现出明显的政权争夺的特点，是一批希望激进改革国家制度并且希望垄断权力的政治伊斯兰支持者与其他支持多元政治、反对权力垄断参与者的矛盾。这一矛盾特点与当时埃及的政治形势也非常吻合。穆斯林兄弟会在 2013 年初开始的强行推动伊

^① 阿尔弗雷德·斯特潘（Alfred Stepan）认为突尼斯的制度可以帮助实现伊斯兰与国家的双向妥协，从而可以帮助其渡过政治危机。参见 Alfred Stepan, “Tunisia’s Transition and the Twin Tolera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3, No. 2 (April 2012), pp. 89-103。曾向红认为，突尼斯所坚持的议会 - 修宪等的路径，相比埃及的先总统后修宪路径更为灵活和民主，从而可以促使其实现妥协。参见曾向红、陈亚洲：《政治妥协与突尼斯的和平政治过渡——基于对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考察》，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2期，第60-81页。

^② James Allinson, “Class Forces, Transition and the Arab Uprisings: A Comparison of Tunisia, Egypt and Syria,” *Democratization*, Vol. 22, No. 2 (February 2015), pp. 294-314.

斯兰宪法和其独断专行, 缺乏包容性的执政策略,^① 使其疏远了大多数先前的“革命盟友”, 只是完全迎合了其自身以监督委员会为核心的保守势力。^② 而反之在突尼斯, 政治伊斯兰的矛盾仅仅只是停留在政策与政党, 这说明当时政治伊斯兰势力试图追求的并非是国家制度的伊斯兰化, 而是试图通过强化自身在议会政党政治的优势和政策上的改变来实现其诉求。根据既有研究, 伊斯兰复兴运动在“阿拉伯之春”后, 虽然并非在政治格局占据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 但由于其自身并没有力量直接单独执政, 故而执政时期还需要较多地参考其他世俗政党的意见, 做出相应妥协, 其自身提出的涉及伊斯兰化的相关议案更多停留在政策与政党层面,^③ 从而导致其政治伊斯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政策伊斯兰与政党伊斯兰。

五 结论

本文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了经历“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和埃及两国参与者在运动胜利后出现的失望问题, 从而在数据上直接分析出埃及与突尼斯的参与者在观念层次上对于此次运动的评估, 并分析其结果对推动埃及和突尼斯“后革命时期”“革命联盟”分裂进程的作用。在埃及和突尼斯“阿拉伯之春”的参与者中, 政治伊斯兰与民主制度两个变量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从而说明这两个国家都存在着理念与权力的斗争冲突。但是, 这两类冲突在两个国家中具体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在埃及, 民主制度与参与者的失望呈现出负相关, 代表了该国支持民主的参与者对“阿拉伯之春”运动后发展的不满, 从而反映出当时埃及政治出现的寡头化和垄断化倾向; 而在突尼斯, 民主制度与参与者的失望呈正相关, 表明支持民主的政治势力对运动后的成果满意, 也反映了突尼斯政治民主化推进较好。而在政治伊斯兰上, 埃及的政治伊斯兰导致的分裂集中在具有较为激进色彩的政权伊斯兰上, 而在突尼斯的政治伊斯兰导致的分裂则集中在具体议题和政党的层面上。此外, 在突尼斯的案例中, 与物质财富再分配有关的经济性因素也是影响参与者分裂的重要指

① 当时反对派试图和穆斯林兄弟会协商, 但是并没有得到穆斯林兄弟会的积极回应, 参见 Neil Ketchley, *Egypt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02-130.

② 穆斯林兄弟会的内部矛盾可参考 Alison Pargeter, *The Muslim Brotherhood: The Burden of Tradition*, London: Saqi Books, 2010.

③ “伊斯兰复兴运动”在突尼斯政治转型所做的妥协包括放弃要将伊斯兰教法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想法、放弃原本将女性地位视为男性的配合地位的条款等, 不过其依然试图在将其政治伊斯兰的理念渗透进国家政策之中, 包括在宪法中需要明确任何对宪法修正不能挑战伊斯兰作为国教地位的条款等。可参见 Roy McCarthy, “Ennahda and the Challenge of Power,”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sada/52597>.

标，反映了突尼斯“后革命时期”的联盟分裂具备了经济冲突的特征。

当然本文研究结论还是很初步的探索，未来还可在如下方面进行探讨：

本文的因变量是“革命者的失望”，该变量只能测量参与者是否失望，从而分析出相应“革命联盟”分裂的存在，但是本文并没有揭示这一失望的程度以及相应分裂的程度。事实上，正如埃及和突尼斯之后的形势发展所显现的那样，虽然两个“革命联盟”都出现了分裂，但是埃及的分裂要比突尼斯的分裂更为严重，而这一差异在本文中无法被定量的方式所甄别，故而需要进一步研究。同样，在目前的研究中，本文还只能看出不同自变量对参与者是否失望的影响，但无法看出不同的自变量对参与者失望的程度的影响。从埃及和突尼斯的政治发展实践来看，不同的自变量导致的“革命者的失望”很有可能出现的程度不同，例如在政治伊斯兰的变量中，政权伊斯兰引发的参与者的失望很可能会比政策伊斯兰和政党伊斯兰引发的参与者失望程度更高。在以上这些变量中，可能也存在着内生的相互影响关系，例如，当参与者的失望程度停留在较低水平时，当时影响的主要变量是政策伊斯兰或者政党伊斯兰或者是经济变量，因为当时参与者最主要的竞争焦点还停留在一般的经济和政策事务上，并没有上升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而当参与者的失望程度进入到较高的阶段，当时影响变量可能就是政权伊斯兰或者呈现出负面效应的民主支持度，因为此时参与者内部的竞争焦点已经变成了极化现象极其严重的政治冲突。

从研究方法来说，本文侧重描述性推论。但是本文的数据数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此外本文在因果推断上还存在问题，只是展示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没有因果性检验。变量仅仅放在个体层面，忽略了宏观形势对个体意识的影响，故而在因果性上无法排除多个相互竞争的假设，需要在之后的研究进一步讨论。

而对于后“阿拉伯之春”政治进程的发展，本研究只是一个起点，其揭示了参与运动的社会联盟之间的内部分裂问题，但这一分裂如何影响到这些国家最终的冲突走向和政治发展结果，不同类型的冲突（如权力斗争和理念冲突等）如何对最终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还需要采取更为多元的方法，尤其是定性研究中过程追踪的方法进行探讨。本文所采取的定量方法还只是这类方法的初级阶段，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也发现存在着系数置信区间过大和变量数据不够和不够均衡的情况，这些问题意味着在未来对于这类研究还需要在定量方法上进一步突破，从而对于事物现象背后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来稿日期：2018-04-17】

【修回日期：2018-05-24】

【责任编辑：谢磊】

127 **The “Disappointment of Revolution Participants” and the Internal Fragmentation of “Revolution Coalition”: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Arab Spring” Participants in Egypt and Tunisia**

ZHOU Yiqi

[Abstract] Since 2011, the Arab Spring movements that swept across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have exerted tremendous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act on Egypt and Tunisia. Among all those relevant research agendas, the participants’ assessment of the movements has become one of the highlights. This paper examines and explores this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appointment of revolution participants”. It argues that the “disappointment of revolution participants” is a variable that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fragmentation within the “revolution coalition” after a remarkable political victory was achieved. The “disappointment of revolution participants” also embodies political rivalries, economic confrontations, and ideological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political factions at the transformation stage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irstly defines the three above-mentioned conflicts as three variables: support for democracy, economic status, political Islam and then proceeds to analyze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disappointment of revolution participants” based on the “Arab Barometer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re that in Tunisia and Egypt,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participants are not happy with the revolutionary progress, though the two countries differ in the specific variables that affect the participants’ disappointment. As for the variable of support for democracy, despite it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isappointment of revolution participants” in both Tunisia and Egypt, the effects in the two countries are diametrically opposed. Concerning the variable of economic status, it has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unisia but little impact on Egypt. As regards the variable of political Islam, this paper classifies political Islam into three dimensions: policy, party and power. These three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Islam display different impacts in Tunisia and Egypt, which reveals the subtle and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Islam and the “disappointment of revolution participants”.

[Keywords] Arab Spring, “Post-revolu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quantitative analysis

[Author] ZHOU Yiq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s for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and Center for West Asia and African Studies,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200233).

(本期英文编辑: 张国帅 高静)